

● 王晓明

潜流 与 漩涡

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晓明 著

潜流与漩涡

——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曲弘梅

责任校对：林福国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王丹丹

潜流与漩涡

——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王晓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39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500册

ISBN 7-5004-0818-8/I·85 定价：5.10元

序

尽管满心不愿意，我现在却不能不承认，那第一个创造出“造物主”这个词的人，真是太有自知之明了。无论是翻着历史书上的记载，还是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在许许多多时候，人类哪里是都能够主宰自己的？且不说安邦兴国、上天入地这样的大事情，就是你个人拥有怎样的心境，甚至连你转什么念头，都常常是身不由己，被另一个强大的力量牵着鼻子走。古往今来，人们给这个身外的力量取了无数的名字，有叫它上帝、命运的，也有叫它历史、存在的，还有人叫它现实和环境，等等。称呼虽然不同，意思却都一样：是它高踞在人类头上，暗暗主宰着我们的灵魂。有时候它的心情比较愉快，能够把社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使统治者谨慎而又明智，老百姓安定而又富足，整个世界都显得风平浪静；于是，我们的神经也就傻乎乎地松弛了下来。心灵开始变得柔软和湿润，幻想的精灵张大了翅膀，想象力更是如奔马脱缰，头也不回地向着理智视线之外的区域飞驰而去。尤其是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一个劲儿地想要超越现实，不是一头扎进形而上的思辨迷宫，就是自溺于个人的审美情感，各种神秘主义的抽象观念，甚至会成为最流行的领带夹，每个人都抢着别上一枚。可是，一旦“造物主”大发脾气，用一连串战争和灾荒，煽旺人类的卑劣习性，使统治者丧失理智，老百姓丧失知觉，社会一片黑暗，苦难无边无涯；一遇到这种时候，我们先前的那点

自信和从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神色不由得严峻起来，两眼紧张地环顾四周，思路也立刻变得狭隘实际，什么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统统都会让位给对现实刺激的真切感受。至于知识分子，更一个个都会重新变成现实主义者，重新开始讲究事物的功利意义，一开口就是“人生”、“现实”和“意识形态”，就仿佛从来也不曾耽迷于那个超功利的精神的天国。人类漫长的精神历史，固然称得上千回百转，曲曲折折，可你仔细看看吧，对现实世界的投入和超越，分明是这长路上的两道最深的轮迹。每一看到这两条轮迹的断续交叠，我就总忍不住要回身仰望路边的高崖，我相信“造物主”一定正抱着双手站在上面，就好象一位英勇的统帅立马山头，望着山下的士兵们奋勇冲杀，尸横遍野，而露出隐隐的笑意一样。

不用说，我正是遇上了“造物主”脾气暴躁的时刻，落入它为人安排的那第二种境遇了。且不讲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大地上一直是战乱频繁，黑暗弥漫，祖辈和父辈们那种执着于现实的人世意识，自然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罢，刚刚有点懂事，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仿佛望不到头的十年浩劫期间，我们如何长大成人，心灵上又遭受了怎样深刻的伤害，每一个与我同代的人，大概也都会永远记住吧。当然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情形是大不一样了，至少我不再象“文革”时那样浑浑噩噩，我现在睁开了眼睛，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索了。但也惟其如此，从这将近十年的活跃进步的热烈气氛当中，我仍然能时时接收到动荡和不安的信息。整个社会远没有到风平浪静的时刻，形形色色的困境和危机，依然毫不留情地直抵到我们的鼻子底下。你想想，一直都处在这样严峻的境遇里，一直都受着人生那艰辛一面的直接刺激，我的精神状态会怎样趋向于拘谨和压抑，思路会怎样地变得现实和粘滞，那些空灵

飘逸的心绪会如何利索地弃我而走，甚至那发自天性的冲动和激情也会如何悄悄地在我心底泯灭：这一切又有什么奇怪呢？

当然，人和“造物主”的关系，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士兵和统帅的关系，至少在有些时候，有些性情比较执拗的人，是能够在“造物主”强行划定的大圈子里面，保持某种相对的独立性的。就拿中国来讲吧，黑暗和战乱固然是绵绵不绝，那种在现实的重压下不为所动，依旧固执于探究超验世界的书呆子，却也同样是历朝都有，代代不乏。因此，看到我的同辈人中间，也有一些人能够不为所动，一面承受着严酷现实的强大压力，一面又那样执拗地寻觅超越现实的道路，我实在是由衷地感到羡慕。你可以说他们耽于幻想，甚至可以担心他们会流于做作，但你却不能否认，他们毕竟是表现出了一份蔑视现实的潇洒，向造化争回了一点人生的主动权。可惜的是，我却无法象他们那样潇洒。或许是眼界太狭窄了，我总是习惯于盯住现实不放，对它给我的伤害耿耿于怀。又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悟性，我对现实的反应往往只会引起事后的懊悔。这样的懊悔积得多了，就会酿成一种反省的热切冲动，以至我常常不太关心那些距离比较遥远的事情，一心只想要分析自己的灵魂：我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反应？这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一旦陷入了这样的分析，我也就完全落入了“造物主”的手心，不但它要把我紧紧地抓在手里，就是我自己的性情和思维方式，也早已注定我无法挣脱它的掌握了。

既然和“造物主”结下了这样一种极其被动的关系，它就自然要反映到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从事的文学研究。照理说，文学研究讲究的是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它应该格外能激发人潜在的个性力量，一个文学研究者尽可以在其他方面充当现实的奴仆，一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他总可以自己做一回主了吧。可实际上，我却连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尽管读到出色的小说，我常常

都会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尽管当回味自己阅读体验的时候，我也常常是格外动心于它的审美意味，可一进入理智分析的层次，一旦开始从整体上认识某个文学现象，我的着眼点还是不知不觉就会滑到那非审美的一面去。正因为总是把现实看得很重，我明明知道有许多文学现象都要比“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更富于审美价值，却还是固执地把后者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不愿很快地另择目标。也正因为那自我反省的愿望过于执拗，我明明知道文学研究是文学王国的一个分省，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它最重要的矿产，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要跨进心理和思想研究的领地，对那作品的创造者投注更多的关心。严格来讲，我实在不是一个正规的文学研究者，非但先就缺乏那份对文学的虔诚感情，就是已经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了，也还是常常要东张西望，一不小心就会拐入另外的思路，活象一个不专心的差等生。因此，当听到一些同行断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价值，正在于充当思想史研究的材料，我竟是那样高兴，这么多同行都走在前头了，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甚至还从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文化热”中受到启发，为自己这不正规的文学研究找到一条新的理由：既然中国人向来缺乏逻辑演绎的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我们民族的许多独特而深邃的思想，都还以种种不系统，甚至是非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那我们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另辟一路，从新文学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是不是也能够触及现代中国人精神变迁的深层奥秘呢？既然我们民族的精神大地上，滔滔流着文学之河，说不定这大河深处的潜流和漩涡，倒能够向我们传递出地母那低沉滞缓的脉跳节奏呢。总之，一面是“造物主”的催促，一面也是自己有意，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试着展开了对现当代中国小说家创作心理的分析。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暂时还不想很快地结束它。而摆在你面前的这一本专论二十世纪

中国小说家心理障碍的书，就正是这工作的一个结果。

最后，还想说一下我作这些分析的基本方法，因为我不止一次地收到过对这方法的质疑的意见。当选定某位小说家作为分析的对象以后，我通常是先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从这些作品揣摩他的创作心态，再参考各种有关的生平资料，最后形成对他创作心理的大致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一个从作品反推作者的过程，我对作品的阅读体验，成了我全部分析的第一出发点。这样的分析方法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和那个譬如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的作家究竟有没有区别？如果把作家的生平也看作一种“文本”，它和那作品的“文本”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当面对作品的时候，它的作者是不是就一定比读者理解得深刻？倘若并不见得，那他们之间在阅读上又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对于这些问题，我曾经在别处说过自己的意见，这里就不想重复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一下作为本书附录的两个问答录，那虽是去年发表的，却仍可以代表我今天的看法。

但有一点还想说的，就是我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分析习惯。我最初并非是存心这样做，只是觉得那些作品吸引我去读，而读着读着，作者的面容却不知不觉地浮现出来，它是那样清晰而又真切，我不由得就要认定，它一定是作者的真实面容，我完全可以照着它来描画作者的灵魂。倘从别人的眼光看起来，我这自然是有些感情用事了，因为那支撑我这确信的，不过是我自己和作品的感情共鸣，那我认定是属于作者的面容，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脸上描下来的。但是，我后来所以会一再重复这样的分析方法，固执地从阅读作品来开始对作家心灵的探究，却正是由于这身不由己的感情用事。惟其有强烈的感情共鸣，我对自己从作品的字里行阅读出来的那个作家，就格外地深信不疑；也惟其与我的面貌颇为相象，我就格外想要将他清晰地勾勒出来。说到

底，还是那个自我反省的强烈冲动，使我选择了这种从作品出发的分析方法。这也难怪，我那分析的动机，本就含有很大的自我反省的成份，从这样的动机出发，就自然会偏爱自剖式的方法，说动机常常能决定方法，真是一点也不错的。

一个研究者，顾名思义，他应该是研究对象的，我这本书的副标题，也明明写着是“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可是，在我自己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分明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记录，我排列出来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心理障碍，有不少就正是存在于我自己的心中。一个人愿意自我反省，这本不是什么坏事，但象我这样在文学研究中掺入大量的自我反省，却恐怕算不得一件好事。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创作心理这个独特角度切入，对中国现当代十二位有代表性的小说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详切地论证他们创作得失的基础上，总结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创作心理障碍，探讨了这些心理障碍所以形成并终未突破的原因，进而论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的深层文化心理变迁。本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独辟蹊径，具有思路别致，探悉幽深的鲜明特点。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1)
第二章 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	(24)
第三章 茅盾: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	(69)
第四章 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 绅士”的理想.....	(108)
第五章 张天翼:过于明晰的世界	(133)
第六章 高晓声:陈家村的代言人	(158)
第七章 张贤亮:鬼魂的 影子.....	(181)
第八章 张辛欣、刘索拉和残雪:疲惫 的心灵	(200)
第九章 韩少功、郑义和阿城:为什么 要“寻根”.....	(219)
第十章 总论:在文学之河的深处.....	(242)
附录一 答黄子平问	(293)
附录二 答《批评家》问.....	(303)

第 1 章

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家当中，鲁迅自然是最卓越的一位。七十年来，读者始终把他那为数并不多的小说作品，看成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包括一些在美国和台湾出版的，激烈否定鲁迅的政治信仰的小说史著作^①，都把鲁迅的小说创作，断定为中国现代小说之河的主要源头。我们不是常说，谁懂得了鲁迅，也就懂得了现代中国吗？这“现代中国”四个字，显然是包括了现代中国的文学的。也许以后的情况会有变化，至少在目前，谁要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大概每一个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会郑重地举手赞同的。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我们现在更已经看清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但有很大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失败。既然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他就不可能仅仅只代表了成功的一面，而应该也同样代表那相反的另一面吧？再说，一样东西的长处和短处，常常是互相联系的，尤其象艺术创造这样精微

① 例如美国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的有关著作。

的精神活动，你就更难把它的成功和失败截然分开了，即便你有意只分析其中的某一面，实际上也还是难免会牵涉到相反的另一面。因此，当我执意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心理局限的角度展开分析的时候，我头一个遇上的，必然还是鲁迅，因为是侧重作家的心理活动，我这分析也就自然要从他的精神特点开始。

这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对他来说，看清楚什么是决定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因素，大概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明显不协调。一方面，他显然把精神的作用看得很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经常是用人的精神状态来解释社会的变动^①，还一再强调说，中国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决定论者，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倒每每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并且告诫别人也这样做。他希望妇女能以天津“青皮”的韧性来争取经济权，在小说《伤逝》里更直截了当地宣告：“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孔夫子把“礼”说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的呆学生子路因此丧命，鲁迅却嘲笑说，倘若他披头散发地战起来，也许不至于被砍成肉泥吧？对于鲁迅这后一种认识，我觉得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向来就有注重“教化”的精神传统，鲁迅毕竟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深受科学思想熏陶，津津有味地捧读过《天演论》的现代人，他不可能不知道物质环境对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决定性影响，不会真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够起民众于蒙昧，他不是屡次说过，现在的民众还不识字，还无从读他的文章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中间不会再有过去的那种迂夫子了，至少鲁迅不

① 他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和十多年后的《随感录·五十九》，便是明显的例子。关于这一点对他小说的影响，可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

是这样的迂夫子。但是，他为什么又把“国民性”之类的东西看得那样重要呢？

人类世界中似乎有这么一条法则，每一种活动虽然都有自己的原始动因，可一旦发展到高级的阶段，它自己的历史就会对它将来的趋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小至一场战争的胜败，大到一个民族的兴衰，都常常能够证明这一点。这条法则尤其适用于人的精神活动，我们对一种新的刺激作出怎样的反应，正是取决于它和我们现有的全部认识形成怎样的关系。我们常常谈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分明又是一种被动性，一种对过去思维经验的身不由己的依赖性。一个人越是成熟，就越不愿听凭外部条件去左右他的认识方向，他总要执拗地按照自己最习惯，往往也是最擅长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这当然是表现了主观对于客观的独立性，可就主观本身而言，却又同时暴露了现在对于过去的依赖性。从鲁迅对精神现象的重视背后，我正看到了这种依赖性。

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鲁迅就陷进了家道陡落的窘境，祖父入狱，父亲早逝，在这一连串尚可估量的损失之外，他更遇上了人类交往中最模糊也最令人寒心的苛待：不是对你怒目圆睁，而是收起原先那见惯的笑容，另换一付冷酷的嘴脸，使你禁不住要对一切面孔都发生怀疑；不是由于你本人的情况，而是因为你身外某样东西的变化而改换对你的态度，使你发觉自己原来是一样附属品，禁不住感到惶惑和屈辱——鲁迅还是一个少年，就不得不独自咀嚼这些怀疑和屈辱^①，这是怎样深刻的幸？我不太

① 鲁迅的母亲回忆说“在那艰难的岁月，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人的歧视，甚至奚落。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恼遭遇。”见俞芳：《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相信中国人对于苦难的种种辟解，事实上，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份不幸的影响。倘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凿开一扇窗户去观察世界，童年时代的不幸就象是构成了鲁迅这扇窗户的窗框。正因为深恶S城人的势利和冷酷，刺心于本家叔祖们的欺凌孤寡，尤其是五十那一类亲戚的卑劣虚伪，①他对百草园的热爱就没有能扩展成对大自然的敬慕，与水乡风景的亲近也没有培养出对田园意境的偏嗜，甚至他在南京和日本学到的科学知识亦未能牢固地吸引住他的注意力②——对病态人心的敏感挤开了这一切。请看他1924年冬天的回忆：“我幼小的时候……是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据说她……亲见一罐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罐沿齐平了。”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在我看来，这是鲁迅描画得最逼人的意象之一，那个腌臢的渍缸里，其实是装着多么可怕的愚昧！在鲁迅笔下，类似这样的回忆还有许多，譬如对无常和女吊这样特别的鬼的描绘，更不要说对衍太太那一类卑劣的人的记叙了，它们都从各个方面让你感觉到鲁迅内心深处的悲愤。人的头脑中固然拥挤着形形色色的感觉和观念，但真正能扎下深根的却是那些潜踞在记忆深处的片断的意象。感觉本来就漂流不定，观念也常常会改换更新，惟有这种片断的意象始终如沉江的巨石，执拗地限定着人的精神底蕴。鲁迅的心灵是那样敏感而丰富，可至少在三十几年间，他萦怀于心的竟多半是“小鲫鱼”一类的阴暗记忆，看看他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吧，有心到童年去淘取愉悦的净水，却还是忍不住拽出了往日的余忿。请想一

① 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

② 他在1907年写《科学史教篇》，结尾却说：“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莎士比亚）……”见《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③ 《论照相之类》，《坟》。

想，从这样的精神底蕴上，他会形成怎样的认识倾向？

当然，仅仅用鲁迅少年时代的经验是不足以解释他整个的认识倾向的，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感受远比他儿时的记忆丰富得多，他势必要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角度。如果鲁迅日后遭遇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甚至有可能逐渐淡忘那往日的阴暗记忆。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他成年之后的经历几乎时时都在印证他少年时代的心理感受，从在日本看的那场屠杀中国俘虏的电影，到1928年长沙市民踊跃看女尸的盛况，这些现实的见闻不断充实那些“小鲫鱼”式的意象的深刻涵义，以至当鲁迅把它们描绘出来的时候，它们早已不仅是往日的印象，而更凝聚着鲁迅现实的真切感受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黑暗的现实不断强化鲁迅过去的阴郁印象，这种印象又使他对黑暗现实的感受特别深切，随着他那种洞察心灵病症的眼光日益发展，他甚至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他越是目睹历史的停滞和倒退，越是失望于那些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就越不由自主地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的各种精神缺陷，甚至到它们当中去寻找黑暗的根源。有位历史学家说，我们将带着旧神迁往每一处新居。就鲁迅的精神发展来讲，这旧神就是他童年时代的阴暗记忆，而黑暗的社会又在所有新居都为这旧神安放了合适的神龛，越到后来，新居的气氛还越合乎旧神的谕示，以至当鲁迅成年以后，对病态人心的注重几乎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认识习惯了。他当然不会被动地依从这种习惯。他有自己尊奉的哲学观念可以依赖，更有近在眼前的切身利益必须考虑，凭借这两者的帮助，他完全能够超越自己的认识习惯。但是，他仅仅是能够超越而已，在他那些深层的心理活动中，在他对世态人情的具体感受中，在他观察社会的个人视角中——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仍然不能摆脱那种习惯。就在唯物主义观念逐渐支配他思路的同

时，那尊旧神依然稳稳地坐在他心理感受的区域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物质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却还会习惯性地“国民性”看得很重。

我们从理性知识当中抽绎出一套对现实世界的完整理解，却又分明体味到另一些截然相反的生动印象：在许多时候，这种矛盾往往成为创造者的努力的出发点；可如果遇到分崩离析的黑暗时代，当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表现得异常复杂的时候，它却每每会成为先觉者的痛苦的总根源。人毕竟不能长期忍受认识上的分裂，他总要尽力把那些出乎意料的感受都解释清楚，这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是能够把大部分感受至少在表面上协调起来的。可是，置身于社会崩溃时期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越是预感到山洪正在远处的群峰间迅速聚集，就越会对眼前这泥沼般的沉闷困惑不解。对现实的亲身体验非但不服从他对人生的理性展望，反而常常使他对这展望本身都发生了怀疑。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就是陷入了这种矛盾的深谷，左冲右突，精疲力尽。我甚至觉得，黑暗社会对先觉者的最大的折磨，就是诱发和强化他内心的这种矛盾。不幸的是，鲁迅正遇上了这种折磨，那个时代以他童年的不幸为向导，以他成年后境遇对这份不幸的强化为推力，一步步也把他拖进了这样的一条深谷。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对于民众的看法。当谈到大众的时候，似乎有两个鲁迅。一个是不无骄傲，认为“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①。并且引用报载北平居民支援游行学生的消息，有力地反问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

^① 见1935年8月27日致尤炳圻信，《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本书中所引鲁迅信中语句，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